

名人童年故事

田珍颖 陈红军 主编

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硝烟中的童年

●叶楠



主持人的话：不忘历史

我们读到的是一段历史。

老作家叶楠把一段历史写在他永不忘记的记忆中。

试想，当日本兵践踏我们土地的时候，一个幼小的中国孩子，真切地听到了敌人铁蹄的橐橐之声，那记忆能不刻骨铭心吗？

历史是过去了的事情，今天的人是不能回过头去亲身经历它。因此，要有对历史的记忆和对历史记忆的传递。一个民族，如果忘了自己的历史，未来也将是模糊的。只有记住了过去，才能感悟过去并思考未来。

不要以为一讲历史就是“守旧”、“老化”。历史是前一辈人留给我们的财富。当我们能看清历史时，我们才能了解自己。

人类每天都留下昨天的历史。

人到中年时，都要与孩子们做朋友，这是我们一生中的一大幸事。因为它会使我们年轻，会使我们的生命力旺盛，会使我们胸中沸腾起少年人的热血。为此，我们感谢读《名人童年故事》的小读者们。

本书的每一篇文章，都是一段历史的记录和见证。它会将我们带回到已经逝去的历史的氛围，让我们从感受历史中，获得启迪。

孩子们，历史是人类宝贵的遗产。不懂历史的人，也不会真正懂得未来。



目 录

- 1 硝烟中的童年 叶楠
- 22 在乡间——童年纪实 贾平凹
- 36 关于“罐头”的记忆 梁晓声
- 52 水草青青育童年 吴冠中
- 64 苦难与立志——童年琐记 新凤霞
- 80 师生情难忘 李国文
- 94 童年纪事 于是之
- 106 动荡童年 叶君健
- 120 童年的记忆 舒乙

目 录

- 130 洮河忆旧 雷达
- 140 战难中晃走了少年时代 袁鹰
- 170 出山 林斤澜
- 194 冬天的回忆 从维熙
- 214 黎明的门槛 刘白羽
- 256 据点 邓友梅
- 308 晶莹的泪珠 陈忠实
- 322 难忘的军旅生活 沈力

我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始，生于豫南小城信阳。这地方，在春秋时代是楚国的一座名叫訾的小邑，它嵌于大别山、桐柏山衔接之处，扼南北要冲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。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，战争极为频繁，中原是主战场之一。如蒋桂、阎冯中原大战，就是在我降生的那一年爆发的。我的老一辈人常说我是由炮声迎到这个世上来的。所以，我记忆屏幕上留存的童年图景的色调，几乎全是枪械般的铁灰色。我的全部童年是在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度过的，日军的屠刀，在我的心灵上，割切下血淋淋的永不愈合的伤口。九一八事变，我一岁；中日淞沪之战，我两岁；华北事变，我五岁；卢沟桥事变，我七岁；次年八岁，家乡沦于日寇之手。我永远记着家乡县城沦陷的那个日子：1938年10月12日；也记着日寇陷城的部队的番号：日军第二军团属下的第三和第十师团……

在这个世界，我最早见到的，也是见得最多的场景，是充塞城乡的灰色的、草绿色的、土黄色的士兵流，先是本国的，后来是日本的。几乎是刚刚懂事，我就能认出各种枪支、手榴弹、枪刺、钢盔、防毒面具……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无论如何也搜寻不出一首儿歌，似乎我从来没唱过儿歌，但那首凄婉的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》，我至今也不会忘却。我记得，在当时，我和同是五六岁的小伙伴，唱起这首歌的时候，相对声泪俱下，似乎这国破家亡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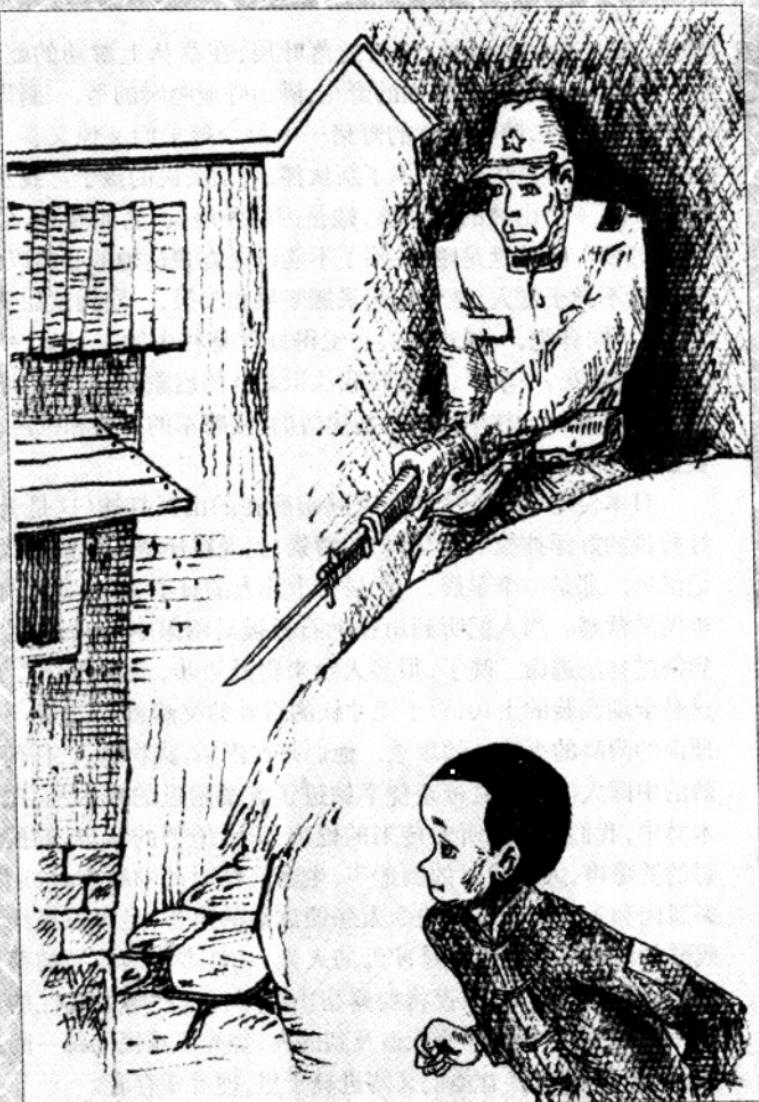




感情最容易懂得，也最容易引起共鸣了。那时候摇篮中的婴儿，就嗅到了战争的气息，就听到了令人心悸的枪声，这是时代强加在孩子们心灵上的不应该有的重负。

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家乡小城，像是被惊扰的蜂房，激昂慷慨的吼声、惊恐的呼号、惶惶不安的叹息、绝望的悲啼，组成了国殇之曲。那时候，我是小学二年级学生，几乎每天，都跟着高年级的学长们的队列，晃着小三角旗，穿行于街衢之中，激愤地作挽救民族危亡的呐喊。我们的呐喊和国军的庞大军旅，都没能抵御日军疾进的铁蹄。先是，带有刺眼的红膏药徽记的日本法西斯飞机临空，带铁翅膀的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凌空呼啸而下……我第一次见到被钢铁撕裂的血肉之躯；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规模的死亡；第一次见到染红土地的大面积的鲜血；第一次目睹了滥杀无辜。那天，我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染上了血红的颜色，包括天空……接着几天狂轰滥炸，炮声临近了，迂回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军西进部队，逼近了城垣。国军的败兵、伤兵像潮水一样涌进城垣，随即又涌了出去，抛下枪械、钢盔，抛下染有血污的军毯、军装，抢劫走他们认为需要的民间财物，四处溃散了……当普通小民，携家带口拥挤着逃出城门之时，城内已经火焰冲天了。到了逃难的路上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们一家再没有自己的居处了，我们同道的所有难民，在一瞬间都成了没有枝头栖息的鸟。

小城难民遵循祖先“小难进城，大难去乡”的惯例，逃进了豫鄂边的大林莽，以躲避兵燹，结草庐筑起难民的营寨。多数人并没意识到，这是一场一个失去理性的民族欲奴役另一个民族，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反抗的持久征战，天真地以为暂避一时即可逃脱灾祸。在这里有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时刻，大人们忙于打临时局，筹措生计。孩子们却被这绿色的林莽所吸引，一切都是新



我永远记着家乡县城沦陷的那个日子……

颖的，遮天蔽日的森林，松软的落叶层，在草丛上游动的蛇，藓苔、蘑菇、松实、毛栗，鲜艳的野花，满山呼应鸣啭的鸟，一瞬即逝的麇子的身影，哼哼哧哧的野猪……都令孩子们又惊又喜。在这山林的避难所中，我结识了新伙伴，包括乡民的孩子。我永远也忘不了一个山林的哑女孩，她是因病致哑的，名叫哑姑，那时只有五岁。虽然她是哑子，除了不能以语言表达她的心曲以外，其聪慧不异于常人，她带我们采撷坚果和浆果，一同掬饮甜美的泉水，一同奔跑，一同欢笑。我觉得她就是林中的一只鸟，一只麋鹿，一朵花，一茎草；她是教我认识森林的启蒙师长，她引导我终生热爱森林。林中的欢乐是短暂的，侵略军的马蹄和枪声，使美丽的山林失去了颜色。

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到我家逃难所在的山区打掳（这是老百姓所说的奸淫掳掠的简化词）的情景，到现在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。那是一个早晨，一队只有十几人的日本骑兵，突然闯入难民的营寨。当人们听到山径上石板被马蹄敲响的时候，才想到钻进林丛逃命。晚了，很多人没来得及迈步，就饮弹身亡了。这是全副武装的士兵，对手无寸铁的百姓的突然袭击，这是一场预谋的阴险的灭绝性的屠杀。他们是在围猎，猎物是人，任何年龄的中国人。我跟着母亲侥幸钻进了营寨附近的灌木丛，在灌木林中，我们颤栗地听着传来的枪声，家犬绝望的吠声，妇孺惊恐的哭嚎声，人中弹时的倒地声，生命终结时的呻吟声，枪刺割裂肌肉和骨骼声……这些令人悲愤欲绝的声音，足可以描绘出残酷的屠杀场景。接着是冲天的火光，这是难民的简易的茅屋被焚烧了，幸存的人今夜将要露宿山野了！这些嗜血成性的强盗，杀光了军刀和枪弹所能追赶到的人，烧光了难民的每一间茅屋，还没有尽兴，接着他们又闯进林子里，搜寻幸存者。



一双肮脏的马靴迈过来了，踏折了一溜草茎，在我的眼前，停住了，近在咫尺。

一双肮脏的马靴迈过来了，踏折了一溜草茎，在我的眼前，停住了，近在咫尺。我感到我的心跳到了咽喉，堵得我无法喘息，母亲警告地用手臂紧紧搂了我一下，我才没叫出来。也许眼前的这个鬼子，只站了一小会儿，我却感到他伫立了很久很久，感到周围的世界凝冻住了。忽然，一阵窸窣声，那双马靴随即迅疾地转了一个角度——他发现了什么，他凶狠地吼叫了一声，像是恶狼叼住了羔羊的咽喉时的呜咽。我看到了一道闪光，是枪刺从上向下直刺下来，我母亲的手猛捂上我的嘴，我只听到一声强制中断的叫声，像绷断的琴弦。当枪刺提起来的时候，向下滴着的血滴，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，分外的红，像是散落下来的红玛瑙珠。那马靴和枪刺终于移去了。很久母亲才放开我，我跳起来，才看到被刺死的是哑姑，我昏过去了。等我醒来，已是满天星斗，到处是燃着的松明火把，幸存的人在火把的光焰下，守着死去的亲人痛哭号啕。在哑姑身旁是她的年迈的奶奶，她的泪已经流干了，痴呆地拿着一张纸，看着叨念着谁也听不明白的话语。那张纸上有哑姑生前画的一群飞鸟，她这幅画是我看着她画出的。本来是我在画鸟，哑姑看了撇撇嘴，用手比画着表示她的不满意：指出我画的鸟，没飞起来，也没鸣叫。她就拿起笔，飞快地画起来，虽然笔画极简单，却很传神。她画的是张着嘴飞翔在天空上的鸟，让人看了，似乎能听到鸟儿欢快的鸣啭声。哑姑的奶奶拿着的就是这一幅画，不同的是，现在画幅已经被哑姑的血染红了。在飘摇的火把的光焰照耀下，那群鸟像是在红色天空中奋力飞翔，唱着歌。那一夜，我一刻也没合眼，任泪水流淌。一面流泪一面看着山下闪光的小河，河边上有很多飘忽游荡的磷火，那时候我相信那是新死者的魂灵，其中也有哑姑。

为了复仇，乡民们从很远的地方请来红枪会的点传师，这是一个既会武功又精于降神术的人物。于是山林中响起隆隆的鼓声，乡民们拿起御匪、狩猎用的刀、矛、猎枪和锈迹斑斑的土炮，竖起红枪会的旗幡，搭起神坛，练金刚罩铁布衫，饮泡有符咒的酒。死亡逼迫乡民奋起，依靠神明和原始的冷兵器，去抗击拥有现代武器的日本侵略军，他们那时只有如此，这是历史的悲哀。他们的抵抗，毕竟使第二次进犯的日本鬼子受挫，使鬼子不能还像第一次，如行刑队一样走进山林，肆无忌惮地杀戮。我目睹了那次悲壮、惨烈的厮拼，乡民是在山谷两侧向谷底行进的鬼子发起进攻的，双方从装备到阵列，到打法，可称得是历史的错位。乡民扑向日军的队伍，像汹涌的狂潮，他们这是在进行自杀性的冲锋——以血肉之躯，去迎接弹雨。当他们与鬼子肉搏，当他们以雪亮的大刀片，将鬼子砍倒在稻田里的时候，我热血沸腾，好像我也置身于厮杀的旋涡之中。那一次战斗，以赶走鬼子而告终。然而，代价是太沉重了，敌我伤亡是 1:50。我又一次看到大规模的死亡，勇士的鲜血洒满山谷。大送殡以后，这一带乡野的乡民，几乎再没有青壮年了，老弱妇孺不得不退向更幽深的林莽。城市逃难来的难民，失去了依托，无衣无食，又面临即将到来的严冬，完全陷入绝境了。只有一条路——回城，当顺民，当亡国奴。谁都知道这是一条屈辱的路，但是，为了活命，所有没有去处的人，终于陆续地向侵略军就范了，回到了沦陷的城垣之中。我的双亲，实在不甘心自投罗网——回到日军统治的县城中去，长吁短叹，无法下这个决心。父母几乎商量了一天，才下定决心：由母亲暂时带着子女回城，父亲则去到平汉路东的非沦陷区，投靠友人寻觅谋生之路，待有了立足之地，再派人接全家前去团聚。话是这么说，但烽火关山，一家分离东西，相逢何年，



实难逆料，也许就是永诀。那次和父亲的分别，是在夜间的山林中的岔路口，别情凄惨得很。父亲在这个年月，远走他方，固然是吉凶难卜，前途茫茫。可母亲呢？怕是更艰难些。当时，我们有兄弟姊妹五人，俱都年幼，我是最年长的一个，也才只有八岁，最小的妹妹不足一岁。带着这一群幼童，进入法西斯军队残酷统治的城市里，就像一只孤单的雌鸟，带着一群幼雏，进入鹰鹫占据的山林，既要奋力护着自己的雏儿不受伤害，还要觅食喂饱它们的肚子，谈何容易。母亲是个没读过书的妇女，也从来没有当过家，竟毅然担起这副她几乎无法担起的沉重的担子。现在想，这是由于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子女的爱的缘故。责任和爱，能使一个妇女具有超常的力量和勇气。

历经兵燹，县城内我们家原有的住房，已经成为残垣断壁而不能居住了，一家六口，只好寄居在亲戚家一间四周瓦砾狼藉的破房里。那时候是真正的家无长物，惟一的一件家具，是借来的一张大木床。这张床宛如一艘船，母亲就是这艘船的船长，全家靠这艘船，度过那些年风风雨雨的凶险日月。

时近腊月，一个晚上，全家围坐在大床上，相拥着以抵御酷寒。忽然，门被打开了，进来一个用围巾几乎遮盖了整个脸庞的人。当他撩开围巾，我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，这是父亲，我们都以为他是来接我们东去的。母亲却不是这样想的，她惊多于喜，忙问：“怎么进的城？”父亲说，他是凭买的假良民证进的城。他说，由于到处是兵匪，无法通过平汉路，一直没能走成。现在决心冒险东去，只是想在走以前再见一眼家人。母亲问：“你进城的时候，没人看见你吗？”父亲说，似乎没有。母亲的担心是有原由的，不仅仅是买良民证犯法，父亲还是日本军方通缉的要犯，这是因为日军曾派人邀父亲任伪职，遭拒，被认为执意为敌的缘

故。母亲担心的事发生了，而且是立即，父亲还没来得及坐下，日军宪兵就破门而入了。不宣告拘捕原由，拳脚交加，铐上手铐，推搡而出。父亲只来得及强扭着头，用血糊着的眼睛，给我们投来温存的一瞥。这是真正的生离死别，此后再也没能见到过父亲的容颜。后来知道，父亲经历了严刑拷问后，被活活坑杀了，迄今不知道准确的殉难之地。

由于我父亲早早地离去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他的形象是很模糊的。那个时代，做子女的是不能打听长辈的身世的，好像这样才是合乎礼法的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后来，零零星星听别人说，父亲似乎在青年时代当过军阀属下的兵，算是行伍出身了。在军队多年，也没混上军官，据说退伍时候，是个士官，那时不叫士官，有一个奇特的职务称谓，我也忘记了。他有点儿文化，我记得他的毛笔字写得挺好。平日他不常在家，总是在东关铺子里，忙他的生意。他的铺子我也没去过，也许去过，没有留下一点儿印象，也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买卖。除了日本宪兵抓捕他那一瞬间，他扭头看我们的样子，在我的记忆中特别清晰外，还记得一件事。那是1938年夏天，我参加全县学生组织的抗日大游行，是环城游行，队伍在途中，还要停下来宣传，由中学里的学生演讲，我们小学生不过是跟着唱歌、喊口号。当时群情激愤，场面是异常感人的，从早晨开始直到下午三四点方绕完城垣。当各校学生解散，各自回家的时候，突然父亲从人群中走到我的身边，看来，他一直在跟随着我们的队伍走。他拉着我的手，眼睛温柔地看着我没说话，但我懂得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意思，他为我能坚持游行到终点而赞许，因为，本来学校是不让低年级学生参加的。那天，父亲特意领我到北关外的一个小饭铺吃饭，这好像是惟一的一次，要的是锅贴。那是我第一次吃锅贴，在吃大米的家



乡，吃锅贴是很不寻常的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告诉我：吃锅贴应该蘸点儿醋。那顿饭，其实是我一个人在吃，父亲微笑地看着我。不过，我觉得父亲的微笑是带着凄楚的微笑。毕竟成年人在国难之时，想得要比孩子多得多，比孩子更早和更多地尝到忧愁的滋味。现在想起来，父亲多半是在想，如此空前的民族灾难，年幼的孩子们如何才能躲得过哟！他哪里知道，遇难的是他。关于父亲，我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。不过，我对父亲的死，是非常钦佩的，他是为不附逆而死的，他的生命终点无疑是他的生命中最灿烂的亮点。

由于父亲被日军宪兵队捕杀，我们家自然是日军眼中的危险分子，属于日伪特别的监视的对象。虽然，一个妇女带着五个年幼的子女，不能给日伪政权任何威胁，日本宪兵队却始终饶不过，常常半夜破门而入，以查户口为名，进行盘查和搜寻，直延续八年之久，到他们投降为止。父亲的惨死给全家，特别是给母亲带来巨大的悲痛。然而，母亲并没有被悲痛击倒，她知道不能倒下，她要活着支撑这个家，抚养子女成人，还要看到丈夫的冤仇得报。责任和母爱的力量，使她挺立了起来，她首先想到的要让孩子继续读书。由于国恨家仇，当然是不会让我们进日本占领军办的学校就读的。当时，由于沦陷区里很多人家都不愿送自己的子女进日军的学校，所以，不少私塾就应运而生，我的伯父就是塾师之一。母亲带着我们去到伯父的住所——也是塾间，一起向伯父下跪叩头，乞求伯父收下我们，作为他的学生。伯父当然应允，他是不会不收自己的侄儿的。

伯父是前清的秀才，由于国民革命，科举废除，他不但没能中举，也一直没有人过仕途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很早就皈依佛教，吃斋念佛，却又没入寺院，不是比丘，而是斋公。斋公的意思大概



我记得我跟伯父就读，是从《幼学琼林》开始的……



就是居士吧。他的家境贫寒，平日是以行医为生的。他并不是坐堂大夫，是属于街头摆摊的杂医，主要是为引车卖浆之流，医治时症及疮疖和外伤之类的病痛，所用膏药、汤药以及丸散等，是自配自制的；也应一些请不起和尚道士的穷人之请，为人诵经超度亡魂和祈福禳灾。日军占领以后，主要做塾师。他精通儒家经典，又熟知佛经，似乎佛儒他都信奉，佛儒在他身上得到极和谐的统一。我记得我跟伯父就读，是从《幼学琼林》开始的，后来是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左传》……私塾的学习，是先朗读，直到完全能背诵，再由塾师讲解的。虽然死板，但对识古文，还是有益的。由于我是他的侄儿，从他读书以外，有时还跟随他到需要的人家去念经，在木鱼的伴和下，背诵着经文。伯父当时就不要求我知道经文的意义，现在也就无论如何也记不起经文的内容了。这种佛事，是善行，并不收报酬，有时倒是主人主动给升把稻米作为酬劳。

维持一家不至于饿死，主要是靠母亲的智慧和辛劳。当时，日军只占领了县城，县城以外不远就鞭长莫及了，农业凋敝，城内一切物质奇缺，特别是食品，极为短缺。母亲决定养猪，她竟在住房周围的废墟里垒起了猪圈。只有那个时期，在城市中养猪才有可能，也只有原本是农家女的母亲，才会想到这种谋生手段。当然，仅靠养猪糊口，也还是困难的。幸而在七七事变前，父亲曾在汉口外国银行存有惟一的一点儿积蓄——大洋八百元；又幸而在太平洋战争前，托人秘密从汉口取回来。有了这八百元，全家才得以在八年抗日战争中，不死于饥饿。

其实，从我懂事起，真正每日能在母亲身边，是在沦陷了的家乡的这个时期，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得到母亲的抚爱，也再也没有机会尽孝道了。以后，我一直上的是寄宿学校，直到我参加解